

# 人工智能背景下机器排挤人现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

罗雯鑫

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17日

## 摘要

该研究结合第三次科技变革背景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技术性失业加剧、技术垄断现象的技术霸凌, 以及数字化转型使资本榨取剩余价值更为隐蔽的三大主要问题, 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 揭示当代机器排挤人现象的发生机理。从而得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仍然是导致产生机器排挤人现象的根本原因, 其本质是资本逻辑下的技术异化, 为批判数字时代的劳资矛盾提供了理论支撑与破解方法。

## 关键词

技术变革, 政治经济学, 社会资本积累理论, 机器排挤人, 技术异化

## A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on of Machines Crowding Out Huma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nxin Luo

College of Marxism,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May 12, 2026; accepted: June 4, 2026; published: June 17, 2026

##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ree main issues: the exacerbation of 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thir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he technological bullying of technological imperialism, and the fact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akes the

extraction of surplus value by capital more covert. It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using relevant theorie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revealing the mechanisms behind the phenomenon of machines replacing human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us, it concludes that the private ownership of capital is still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phenomenon of machines replacing humans, and its essence is the technical alienation under the logic of capital,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solutions for critiquing the labor-capit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digital age.

## Keywords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Political Economy, Social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ory, Machines Crowding Out Humans, Technical Alien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在第三次科技变革背景下，经济全球化深刻展开[1]，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的样貌。与此同时，资本逻辑下“机器排挤人”现象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隐蔽性同步加剧，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重大现实议题。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经历：第一，技术性失业浪潮汹涌，工业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使汽车制造、电子生产等领域的一线工人被大规模替代[2]，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呈现“空心化”趋势，2024年全球青年失业率高达12.8% [3]，科技变革带来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直接导致劳动力需求结构性缩减；第二，技术垄断现象凭借核心技术垄断来构建“中心-边缘”国际分工，发展中国家劳动者既面临传统制造业岗位被机器替代，又面临着“数字产业链末梢”承受数据剥削，技术垄断现象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技术依附与不平等持续加剧；第三，数字化转型使资本将剩余价值榨取从物质生产领域延伸至数字再生产领域，用户的社交数据、消费行为被算法转化为资本增殖要素，人们的活劳动所带来的剩余价值在“技术中立”的表象下被更加隐蔽的剥削。

面对上述困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展现出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和批判性。本文以马克思社会资本积累理论为核心对当代数字资本主义带来的问题展开分析，目的在于揭示资本逻辑下机器排挤人现象的发生机理，论证资本主义私有制仍是技术异化的根源，并从技术民主化、算法正义等维度探索破解路径，希望能为数字时代劳资矛盾的批判与超越提供理论支撑，从而推动技术从资本控制的异化力量向人类解放的工具回归。

## 2. 第三次科技变革背景下机器排挤人的问题提出

### (一) 技术性失业现象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再次加剧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技术性失业现象再次加剧，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如 Acemoglu, D. & Restrepo [4]在研究中表明每千名工人中增加1台工业机器人，会导致就业人口比下降0.2%~0.3%，工资降低0.25%~0.5%，直接印证了在工业领域，大量企业为追求更高生产效率和利润，加速自动化与智能化改造。如汽车制造行业，以往大量依靠人工进行的焊接、组装等工作，如今已广泛被工业机器人所取代，这些机器人不仅生产效率高，而且产品质量更稳定，导致许多一线产业工人失业。电子制造工厂也不断引入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能够快速精准地完成元件安装、检测等工作，使得对普通工人的需求大幅减少。

从职业技能需求角度来看,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市场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银行组织在 2016 年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Digital Dividends* P22~P23 中直接指出,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呈现“空心化”趋势,中等技能岗位(如常规性认知和体力工作)减少,而高技能(非例行认知工作)和低技能(非例行体力工作)岗位增加。这一现象与自动化技术替代中等技能岗位密切相关。发展中国家电子制造业的自动化率每提高 10%,低技能岗位需求减少 6%~8% [5],由此可见仅具备传统技能和低学历的劳动者,将会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工作岗位需求。而这种技术替代的直接后果是劳动力需求的结构性减少[6]。从而导致了技术性失业现象(2024 年全球青年失业率达 12.8% [6])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再加剧。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应用的阶级本质。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对就业的影响实际上并不是单向替代的逻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指出,机器在排挤部分劳动者的同时,往往会在其他部门或环节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例如,人工智能的发展催生了数据标注、算法调试、模型训练等新兴职业。这些岗位虽然在劳动形态、技能要求与收入水平上与传统的工业劳动存在显著差异,但其出现本身恰恰说明,技术进步对就业结构的重塑具有双重性。

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资本形态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显著的策略差异。平台资本倾向于通过算法实现对零工劳动者的精确控制与成本转嫁;产业资本则更注重通过自动化降低直接生产成本;而金融资本则往往以技术企业为中介,通过投资布局影响技术发展的方向。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揭示“机器排挤人”现象背后的资本结构多样性,避免简单化的技术决定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应关注技术所催生的新劳动形态与资本内部的结构分化。

综上,机器排挤人现象在第三次科技变革中最直观地表现为——通过直接降低对简单劳动和体力劳动的需求,从而直接导致技术性失业。

## (二) 资本主义视阈下技术霸凌带来的机器排挤人矛盾

发达国家依托核心技术垄断重构国际分工体系[1],使得发展中国家只能承接低附加值环节,这种“中心-边缘”结构本质是技术垄断现象的新形态:发展中国家劳动者不仅面临制造业岗位被工业机器人替代,更因技术依附被锁定在“数字产业链末梢”(例如:印度从事数据标注的工人,负责标注图片训练西方 AI 模型,时薪却不足 0.5 美元)。这种全球规模的“机器排挤人”现象,既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规律在空间上的扩展,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社会化发展的桎梏。

在这时,技术垄断现象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和剥削。发达国家通过掌握核心技术和数据控制权,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使得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这种技术上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制造业领域,还渗透到数字产业等新兴产业中,由此,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

与此同时,技术垄断现象还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技术依附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不得不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和标准,这导致其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缺乏自主性和主动权。这种技术依附不仅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潜力,还加剧了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化趋势。

由上我们可以得出技术垄断现象视阈下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于:其一、核心技术垄断带来的技术霸凌造成了技术集中与全人类发展之间的矛盾。技术垄断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技术壁垒,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与剥削,从而阻碍了生产力社会化、全球化提升,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背道而驰。其二、资本剥削在第三次科技变革下转变新形式,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工人就业与机器替代之间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

由此可见,技术垄断视阈下资本有机构成提升现象的空间扩张及其带来的机器排挤人矛盾是当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 (三) 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改变了剩余价值的榨取方式

在第三次科技变革背景下资本家为了避免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与时俱进”地改变了剩余价值的榨取，具体表现为：资本通过占有数据生产资料和算法控制权，将劳动剥削从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数字再生产领域。这实质是将劳动者社交活动产生的数据纳入剩余价值榨取链条，更加印证了马克思“活劳动是剩余价值唯一源泉”的论断——只不过其中的“活劳动”概念已从工厂流水线延伸至数字生产的全领域，这本质上是第三次科技变革背景下机器对人更加隐蔽的异化。

在此过程中，劳动者不仅在生产过程中被剥削，在其日常生活与社交活动中产生的数据也成为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数字平台通过算法对用户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分析，进而精准推送广告与商品信息，诱导用户消费，从而实现了对消费者剩余价值的榨取。这种榨取方式相较于传统的物质生产领域更为隐蔽且高效，因为数字平台能够实时追踪用户行为，并根据用户偏好调整推送策略，最大化地激发用户的消费欲望从而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如网络卖货平台对个人文化娱乐生活的侵入，不仅克服时间、地点上的消费障碍，更有主播根据用户的喜好进行数字营销，在庸俗化的流量制造、噱头捕捉的种种表演下，产品本身的价值反而被弱化了。在数字环境的长期浸染下，人的真实需求边界与资本的虚假需求边界逐渐模糊，人的需求判断由数字算法所主导，人的需要由数字技术所主导[7]。

数字化转型还使得资本能够跨越时空限制，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剩余价值榨取。数字平台通过构建全球性的用户网络，将世界各地的劳动者与消费者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数字市场。在这个市场中，资本可以不受地域限制地流动与配置资源，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其榨取剩余价值的能力与范围。

这种数字具有超时空性和渗透性的数字剥削，形成比传统工厂更隐蔽的异化机制——劳动者在消费环节持续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而算法主导的需求判断使数字技术成为控制人类行为的新工具，体现了资本逻辑下人工智能对人的异化。

## 3. 资本逻辑下机器排挤人的发生机理——马克思社会资本积累理论的透析

### (一) 马克思社会资本积累理论的核心逻辑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积累理论从资本积累的本质及其动因出发，揭示了资本逻辑下资本有机构成提升的必然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下必然产生机器排挤人现象，再生产相对过剩人口从而造成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恶性循环，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 1) 资本积累的本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社会资本积累的双重属性：一方面，资本积累是剩余价值不断转化为新资本的过程，表现为生产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这种积累必然伴随资本有机构成(C/V)的持续提高，即不变资本(生产资料)对可变资本(劳动力)的替代[8]。其核心公式为：剩余价值(M)→新资本(C + V)→更大规模的剩余价值(M')。

#### 2) 资本积累的动因

对于资本积累的动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中也作出了详细的表述，可以总结为：竞争压力与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能的双重作用。

资本有机构成表现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价值比例(C/V)，其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必然趋势。在资本体系中，个别资本若无法通过技术革新与规模扩张降低成本，就会被更高效的竞争者淘汰。这种压力迫使资本家将剩余价值不断转化为新资本，购买先进设备，以维持市场优势。与此同时，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婪具有自我增殖的天然属性：剩余价值不仅是积累的起点，更是资本扩张的目的本身。资本家如同“为增殖而增殖的自动主体”，即便已获得超额利润，仍会通过延长劳动时间等手段来榨取更多剩余价值。

### 3) 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与相对过剩人口以及机器排挤人理论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指出，机器排挤工人的本质是“用更高效的不变资本替代低效的可变资本”，可以理解为机器排挤工人程度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成正比的。同时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积累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相对过剩人口生成之间的内在联系。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规模扩大，资本家将更多剩余价值投入机器、厂房等生产资料，而非雇佣工人。例如，工厂主以蒸汽机取代手工工具，或引入纺织机械替代传统织工，使得单位商品所需的活劳动量锐减。这一过程直接导致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下降，劳动力需求相对缩减，从而将大量工人排挤出生产领域。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的规模越是扩张，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越是迅速，对劳动的需求就“相对地越减少”。被机器排挤的工人并非暂时失业，而是成为“相对过剩人口”——一支游离于生产之外的“产业后备军”[8]。

结合以上内容，从联系上看，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既是资本积累的条件，又是其必然结果，并在二者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必然出现机器排挤人现象：一方面，过剩人口为资本提供了随时可调用的廉价劳动力对资本的积累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技术进步驱动的资本积累过程中提高技术占比而排挤工人不断再生产出新的过剩人口，形成“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恶性循环。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根本矛盾：一方面，生产力发展要求扩大生产；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限制了消费能力，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危机。从而暴露出“资本本身才是自身的限制”。

#### (二) 社会资本积累理论对当代机器排挤人现象的发生机制解释

在第三次科技变革背景下，机器排挤人现象通过数字技术与全球化生产的结合，以更隐蔽、更复杂的形态展现，具体表现为本文第一章中的三方面的问题，基于对马克思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解释。

##### 1) 资本有机构成加速提高加剧机器对人的排挤

第三次科技变革背景下，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为核心，显著提高了生产资料(不变资本 C)在总资本中的比例。以工业机器人、云计算基础设施和算法系统的投资为例，这些技术的应用大幅减少了单位产品所需的活劳动(可变资本 V)。根据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8]，C/V 的提高直接导致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减少从而在结构性失业方面加剧了机器对人的异化。这种异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该矛盾在新技术条件下必然体现为技术异化。依据《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为了突破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资本必然通过技术手段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以机器替代活劳动。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悖论：技术本应成为解放劳动的工具，但在资本逻辑下却异化为排挤劳动的反对力量，因为只有将活劳动不断转化为可被机器替代的数据参数，资本才能更好地维持其增殖运动，而这恰恰加速了其自身矛盾——生产无限扩大与消费能力相对削弱的爆发。技术本可作为解放劳动的工具，却在资本逻辑中被异化为支配劳动者的力量，这一过程印证了马克思社会资本积累理论的核心论断：资本积累的对抗性矛盾在数字时代以技术性失业的问题再现。

##### 2) 科技变革在技术垄断现象视域下的科技异化

技术垄断现象作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扩张的新形态，本质上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规律”在全球空间的体现，掌握技术尖端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技术垄断的原始积累与数字平台的资本积累，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面临“传统产业被机器替代、新兴产业被数据剥削”的双重困境[9]，形成了全球性的“机器排挤人”现象。

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技术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先发技术优势，通过技术壁垒和数据殖民主义

完成对发展中国家的“数字资本化”改造——发达国家通过工业机器人垄断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将发展中国家挤压至低技术含量的组装代工领域[1]，导致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对普通工人的需求锐减(如电子制造业自动化率每提高 10%，低技能岗位需求减少 6%~8%) [3]。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这一现象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相对过剩人口再生产的全球表现——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投资技术(不变资本 C)减少对劳动力(可变资本 V)的依赖，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则被挤压至“非正规就业”领域形成全球化“产业后备军”，印证了资本论中“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恶性循环”的论断。技术垄断现象的深层矛盾在于生产力的全球化与生产关系的私有制对立，数字技术本可推动全球协作却异化为垄断工具(如 ASML 垄断高端光刻机阻碍发展中国家半导体产业)，第三次科技变革为世界带来了经济全球化却在资本逻辑下同时也带来了全球性的机器排挤人现象。

### 3) 数字资本对剩余价值榨取隐蔽性分析

马克思强调“活劳动是剩余价值唯一源泉”，而数字化转型将活劳动的范畴从工厂延伸至“数字再生产领域”。在第三次科技变革的数字化转型中，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榨取隐蔽性通过数字技术与资本逻辑的深度融合得以实现：数字平台以“免费服务”为幌子，将用户社交互动、消费浏览、内容创作等行为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资产，在“用户参与”的表象下无偿占有其隐性劳动——当用户在社交媒体发布动态、在电商平台评价商品时，其点击频率、停留时长等数据被算法捕获并转化为用户画像，成为资本优化营销策略的核心生产要素，这种“数据劳动”被包装为“用户体验”，劳动者却未意识到自身正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算法作为资本控制的“数字监工”，以“技术中立”的外衣构建非人格化剥削机制，在零工经济中，外卖骑手等劳动者看似“自主接单”，实则被算法通过配送路线优化、时效设定等手段精准规训，劳动强度被量化为毫秒级数据指标，资本将传统的强制性监督转化为劳动者基于系统评级的“自我管理”，使剥削从可见的雇佣关系变为无形的数据规则压迫；与此同时，“消费即劳动”的新型范式悄然形成，资本通过算法向用户精准推送个性化广告，利用大数据分析制造“信息茧房”诱导非理性消费，将购物行为从需求满足异化为剩余价值实现的延伸环节，短视频平台的“沉浸式浏览”、电商平台的“限时秒杀”等机制，使消费者在“自由选择”的假象中被动参与价值创造，其可支配收入在生产领域被榨取后，又在消费领域通过“自愿买单”完成二次剥[7]；数据的无形性、算法的黑箱化与平台经济的虚拟性，共同构成掩盖剥削本质的“技术面纱”，资本借“数字化转型”的叙事将活劳动的榨取从工厂流水线延伸至社会生活全领域，使剩余价值生产在“用户主权”“技术赋能”的话语中实现无缝衔接，而这一切本质上仍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支配活劳动”的逻辑延续——数字技术并未改变资本剥削的本质，反而通过重构劳动场景、模糊劳动边界，使其更具渗透性与欺骗性。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数据劳动”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重要环节。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活劳动，数据劳动往往表现为用户在数字平台上的日常行为——浏览、点赞、评论、社交互动等。这些行为在形式上并非典型的“工作”，但在资本逻辑下，却被转化为可量化、可提取、可交易的数据资产，进而服务于广告投放、算法优化、模型训练等价值增殖过程。

根据数字马克思主义和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数据劳动的核心特征在于“劳动与生活的边界模糊化”以及“劳动过程的非契约性控制”[3]。与传统活劳动相比，数据劳动的剥削方式更加隐蔽：劳动者未意识到自己在“工作”，资本也未承担相应的劳动保障义务。然而，数据劳动仍然是“活劳动”的延伸，因为它仍然依赖于人的认知、情感和时间的投入。正是这种投入，赋予了数据以使用价值，从而成为剩余价值的潜在来源。

因此，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明确区分“数据的劳动来源”与“数据的资本实现”，从而为后续的制度设计提供理论依据[2]。

## 4. 机器排挤人现象的破解启示

###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在第三次科技变革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相对过剩人口的全球化再生产、剩余价值榨取的隐蔽化等规律，均在数字资本主义中以新形态再现。根据前文我们可以得出：技术异化(如算法控制、数据垄断)并非技术本身的必然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对人的异化，这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得出的“资本本身才是自身的限制”结论是完全吻合的，证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力量在当代仍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第三次科技变革带来的机器排挤人现象，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数字时代的矛盾外化。马克思社会资本积累理论揭示，资本逻辑主导的技术进步必然导致“机器排挤人”，而破解这一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超越资本对技术的支配，构建“技术服务于人”的新型生产关系。从国内层面的生产关系重构，到全球层面的技术正义追求，其终极目标均指向马克思预言的“自由王国”——当技术从资本增殖的工具转化为解放劳动的力量，机器将不再是人的对立面，而是成为拓展人类自由时间、实现全面发展的得力助手。这一历史转换的实现，既需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和不妥协性，更需要将其付诸实践将其转化为变革现实的实践力量，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使命所在。

### (二) 呼吁技术普惠化与数据主权重构

根据前文分析，第三次科技变革背景下虽然带来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技术却在资本逻辑下异化为排挤人的力量，其本质源于资本逻辑下生产社会化与生产关系私有制的对立。所以唯有通过技术普惠化与数据主权运动，才能打破资本对技术的私有化控制，使其回归“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通过技术普惠化把信息数据的主权从资本家手中夺回，从而突破技术垄断对人类解放事业的阻碍；通过全球劳动联合重构生产关系，使机器从排挤人的异化工具，回归为“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扩展自由发展空间”的解放力量，把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愿景转化为数字时代的实践，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使命，更是人类迈向“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社会的必由之路。

### (三) 强调算法正义反对数字时代的新型剥削

第三次科技变革背景下算法被异化为资本家无偿占有用户休闲时间与引导用户进入消费陷阱的工具[7]，对此人们应该对此保持清醒并予以批判：算法正义的缺失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数字时代的异化延伸。算法作为资本权力的技术具象，其设计、运作与迭代始终服从于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逻辑，而非服务于人类解放的伦理诉求。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对于算法正义的批判必须透过技术中立性的现象，用清醒的头脑去揭示其作为资本控制工具的剥削本质。对此全世界的消费者与劳动者应该联合起来发起例如“数字断连运动”的倡议，拒绝资本家利用算法制造的虚假需求实现隐蔽剥削。以韩国“反推荐算法联盟”为例，该联盟号召用户关闭 TikTok 个性化推荐，2024 年该平台在韩广告收益下降 23%，倒逼企业调整数据利用策略。这次运动印证了马克思“联合起来的个人”理论——唯有通过跨主体协作，才能瓦解资本对生活世界的殖民格局，实现技术向服务于人的本质性的回归。

### (四) 在批判中探寻现实制衡

在坚持根本性变革方向的同时，我们也应积极探索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可能实现的改良路径。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措施并非为了替代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反而为更根本性的转变积累了力量与经验。

具体而言，本文建议建立以用户为委托方、第三方机构为受托人的数据信托机制，明确受托人对数据使用收益的议价权与分配职责，使用户能够依据数据贡献获得合理回报；设立法定或行业公认的独立算法审计机构，定期对平台企业的算法系统开展公平性、透明性及劳动影响评估，审计结果应向社会公开并接受监督；在法律层面确认劳动者或用户组织针对数据使用条件的集体谈判权，允许其围绕数据采

集范围、使用方式及收益分享比例等事项与平台企业进行协商，并参照传统集体协商制度建立相应的争议解决机制；对自动化与人工智能设备的大规模使用者开征机器人税，税率依据设备替代人工的规模与行业利润率分级设定，所征税收专项用于建立技术性失业保障基金、职业技能再培训体系以及受冲击社区的转型支持。这些制度设计并非否定根本性变革的必要性，而是在现有条件下对资本权力形成实质性制衡，为更长远社会转型积累制度经验与政治力量。

## 参考文献

- [1] 黄光耀. 三次科技革命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3, 22(8): 15-17.
- [2] 周绍东. 拨开数字平台的三重迷雾[EB/OL]. <https://m.hbskw.com/p/85635.html>, 2025-11-20.
- [3] 黄静秋, 邓伯军. 上网也是劳动吗?——数字劳动泛化批判[J]. 观察与思考, 2023(12): 15-24.
- [4] Acemoglu, D. and Restrepo, P. (2020) Robots and Jobs: 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8, 2188-2244. <https://doi.org/10.1086/705716>
- [5] World Bank (2016)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Digital Dividends.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wdr2016>
- [6] 联合国新闻. [世界进行时] 2025年1月17日[EB/OL].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5/01/1135231>, 2025-11-20.
- [7] 陈文怡, 胡小君. 数字消费主义陷阱下消费主体的身份困境和破解路径[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0(3): 31-40.
- [8] (德)马克思, 著. 《资本论》第一卷[M].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09.
- [9] 董键铭. 数字帝国主义的演变与扩展——基于原始积累、资本积累角度的分析[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9(4): 61-70.